

追寻

Z H U I X U N

李蕴晖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追寻

ZHUIXUN

李蕴晖 著

1825
1794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李蕴晖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ISBN 7-226-02643-0

I. 追... II. 李... III. 李蕴晖 - 自传

IV. 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0081 号

责任编辑:牟克杰

封面设计:祁 霁

追 寻

李蕴晖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15 千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6-02643-0/K·451 定价:16.00 元

帆

(俄)莱蒙托夫

一只孤独的帆船

在茫茫的雾海中闪着白光

她追寻些什么？在遥远的异乡

她丢弃些什么？在养育她的故乡

波涛汹涌，海风狂啸

桅杆嘎吱作响

在她的下方是蔚蓝的海水

在她的上方是金色的阳光

她既不追求幸福

也不从幸福中逃亡

目 录

- 一 向往求学 / 1
- 二 成长与转折 / 9
- 三 以言获罪 / 19
- 四 跟踪定右派于哈尔滨 / 31
- 五 初涉人世 / 36
- 六 支援兰州建设 / 48
 - (一) 兰州在饥饿中 / 48
 - (二) 去青海吃湟鱼 / 55
 - (三) 红糖果带来了希望 / 58
- 七 孤独地面对 / 62
 - (一) 离去 / 62
 - (二) “我就不是右派” / 67
 - (三) 小生命降临 / 72
 - (四) 乘人之危 / 74
 - (五) 两个天地 / 79
- 八 “文革”风暴 / 87

- 九 “牛棚”见闻 / 115
- 十 群众监督改造 摘掉右派帽子 / 146
- 十一 摘帽以后 / 162
- (一)裤子 鞋子 煤球 / 162
- (二)搞“教育革命”去 / 167
- (三)宁县之行 / 180
- (四)这样的童年 / 190
- (五)至亲离去 / 192
- (六)摘帽以后的工资评定 / 205
- (七)人挪活 / 209
- (八)混沌 曙光 / 215
- 十二 雄关漫道真如铁 / 229
- 十三 右派改正 / 238
- 十四 尾声 / 264
- 十五 后记 / 268

一 向往求学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父亲在四川卸职闲居。1947年秋,携家口返回到故乡湖北武昌。当年父亲已有六十多岁了。常年的家庭重担使他显得十分老迈,加上有病,几乎终日卧床不起。1948年我14岁时,父亲静悄悄地在家中病故,留下五十多岁的母亲、我、比我小两岁的弟弟,还有大哥的女儿,她大约比我小三岁吧!

我的母亲皮肤白皙,眉清目秀。她是清代一位秀才家的女儿,能写字,会吟唐宋诗词,什么“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念着念着手就指向前方,好像杏花村就在前面了。还吟“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些,给我孩童的心灵中引出许多遐想。在吟杜甫的《绝句》中“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叶绍翁的《游园不值》中“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时,让我进入了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此外,《游子吟》、《枫桥夜泊》、《乌衣巷》,经常在她的口中迸出,叫我百听不厌。她还告诉我和弟弟:“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为此,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小孩是个诗迷,他的母亲让他打扫庭院卫生,他却顺口道来:‘打扫门前雪,放出笼里鸡。’他的母亲听到后便说:‘又在吟诗了。’他辩解说:‘分明在说话,又道我吟诗。’”我的母亲总是这样诗情画意,浑身散发出一股灵气。她不仅文气,而且能干、善言辞、坚韧、遇难决不退缩。但她没有职业,她的职业就是主持家务、照顾好丈夫、生儿育女。

父亲于1946年离职后,家中的生活来源靠姐姐补贴。那时,她是北平邮局沙滩北大办事处的一名职员,比我长12岁。她非常孝道,爱弟妹,每月给武汉寄点钱来维持一家的生活,经济自然是相当困难的。我们住的是别人的房子,而且只有一间。为了让老少三代分开住,用竹席子将一间隔成两间,竹席留有一个空洞作为两间相通的门。前面那间由父母住,还带上他俩的幺儿子;后面那间住着我和侄女,而且是用木板搭成的上下铺。从后屋穿出去,经过几米的露天甬道,就到达一个6平方米的厨房,再沿甬道往后走十几米,就是坑式公用厕所。这就是我家的生活天地。我的父亲工作了一辈子,没有给母亲留下一间住房,也没有留下较宽裕的生活费,只有靠姐姐寄钱维持生活了。

不知什么缘故,从幼小的记忆中,我们这群孩子,就没有吃早饭的习惯,一起床,我和弟弟、侄女就各人背着书包上学去。回到武汉后,隔壁邻居买回油条、米糕或油炸窝窝当早饭,我家当然力不能及,因此,一直因循着自小养成的不吃早饭的习惯。这可能是母亲节约的一种方式吧!

家庭生活已相当艰难,中午放学回家,母亲炒好了一个青菜,在一碗米汤内放上盐、葱,摆放在桌子上,每天如此。

一个星期天,我随母亲上菜市场,那里有蹦蹦跳跳的鱼、虾、螃蟹、活鸡活鸭、绿油油的青菜,五花八门,令我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活生生的供人享用的丰富的动植物世界,我吵着要买这买那,母亲总是笑着不理、不解释地走过去,我只有失望地跟在她身后。从那次以后,她再也不带我去菜市场了。

武汉国立中学的学费是缴一袋米。为了申请免缴,我曾经两次上台,在班上和礼堂讲述我的家庭经济状态。我的一个要好的同学也上台为我说话,而且她说着说着,就大声地哭起来了……

我姐姐的好友之母与我的母亲年龄相仿。一天,她拎着一袋

米送到我家。母亲只身承受着压力,从不我和弟弟叫苦,也从不说不说没有钱的事。但我已懵懵懂懂地感到生活的压力,总有随时辍学之感,经常萌发出去做保姆养活母亲、弟弟和侄女的念头。

尽管家境如此清贫,但是母亲还是让我和弟弟继续上学。那时,我和弟弟年龄都太小,又能做什么体力活呢!晚饭后,一盏油灯照着我们母子三人,母亲缝缝补补,我和弟弟温习功课。母亲继承了父亲的育子思想,而且,她的民族尊严也极强。记得我刚回到武汉时,看到武汉城市之大,长江之美丽,实非四川城市所能比拟,因此脱口而出:“我们为什么要跑到四川去呢?”母亲坚决地、明朗地说:“假如我们不逃到四川,你父亲是会沦为汉奸的。”这让我明白,一个人是不能卖国以求生存的。

父亲是清朝出生的。他年幼时,祖母孀居,靠给别人洗衣服为生,所以他从小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以后当兵,步入军界,而后入政界,在民国时期当一名小官吏。他为人耿直,为官清廉,奉行仁义礼智信。他的为人之道深刻地影响到与我同父异母的长兄(我的母亲是续弦,即填房的意思)。长兄是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念化工的。母亲时常对我讲,大哥在汉阳兵工厂工作,因告发厂长贪污,厂长把贪污的事嫁祸于另一名下属而自身逃脱罪责并将大哥免职。此事足见父亲育子之道,他使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孕育了正气。还有一件事,我的同胞兄长在上初中时,学校写信到家,告发他上树摘苹果。他放学回家后,父亲让他搬一条长凳放在全家人面前,责令他趴在上面,他乖乖地就范了。只见父亲执鞭狠狠地打他的屁股,边问:“还偷不偷?”哥哥疼得大叫,大喊再不偷了,再不偷了,父亲方才罢休。时隔六十几年,我依然记忆犹新。如今,我已步入老年,反思这件事,认为父亲把少年的好奇和调皮与偷混为一谈了。本来可以循循善诱开导的事,说成偷盗行为,施以暴力,实在过严,缺乏仁慈。但是,一种是非观、一股正气感却深深地打进我幼稚的心坎上。

正因为他正直,所以仕途并不得意;正因为他清廉,所以在1946年辞官时,竟没有什么积蓄。从他平日的感叹中,他是很不愿意在官场上混的,但他没有一技之长,为了生计和一家人吃饭,只得屈就。他常常念叨自己文化低,到了10岁,连个“大”字、“天”字和“太”字都分不清楚。所以,他希望孩子念书,学一门技术,常对我和弟弟说:“身缠万贯,不如薄技随身。”以此鼓励孩子们学技术。他特别厌恶女孩子干家务活,我一拿针线,他的眼睛就瞪得大大的,让我畏惧;我一进厨房帮忙,他也怒而不发地盯着我,但我拿起书,提起笔来,他就平静下来,认为这才是走正道。用他的话说:“女人经济独立,将来不遭丈夫、外人欺凌。”父亲的感化和教育,在我心里生了根,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那时,尽管我感到生活的压力,感到前面要走的路渺茫而十分痛苦,但追求学习的信念从未动摇。

1949年4月23日武汉解放,那时我正在念高中二年级。学校的同学有参军南下的,有上革命大学的,搞得热火朝天,正因为不能学技术,我周而复始地在革命大学的门外面徘徊。

1949年3月,北京和平解放,我姐姐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她没有了工资,我们一家四口生活更加紧张,副食仍然是青菜米汤,母亲常独自坐在房门口发呆,露出无助的眼神。

1949年下半年,又要缴学费了。时逢姐姐随部队南下,她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裹着绑腿,领我到区政府谈了情况,然后就离开了。区政府一位麻脸着军服的干部字迹歪歪扭扭地给我开了一份证明,让我拿上。我现在已记不得写些什么,回家拿给姐姐看了,她说:“写得真实,语句急切。”我当时对那位麻脸干部的感觉陡然升华——透过一张平凡的穿着军服的外表,展示了一颗无私、无畏、解放全人类的心。我将这份盖有区政府章的证明交给了学校,于是我又上学了。

1950年,我还不满17岁,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到全国招生,也

到了武汉。以武汉为点,招湖北湖南两地的学生。招生简章上写的是入学后全公费,管吃住,而且不缴学费。真是绝路逢生,我那摇摇欲坠的求学愿望迫使我非抓住这个机会不可。如果能考上,我再也不会为学费发愁了,吃也解决了。至于穿,我从小就没有穿什么,一件蓝色的长大褂几乎一年四季都穿着,已穿了两年了,穿脏了,晚上洗,白天再穿上上学。冬天,加一件自己打的红色毛衣,再穿上一条长裤子就过冬了。所以我没有想到穿,以为只要吃饱,不愁学费,就可以生活下去。环境和家庭教育使我没有一点点少女对仪表上的追求和虚荣感。

我大胆地去到汉口报名地点,以同等学力填写了报名表。考场设在我念过书的学校——汉口市立第一女中的饭厅。我进到了可容纳400名考生的考场坐定,一位长得异常英俊、长满络腮胡子的大个子男同志宣布考场纪律,他操着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东北口音,语音洪亮,条理清楚,更增加了我要去东北求学的愿望。这位男同志就是入学后的田教务长,口才极好,以后又调到外交部任大使。现已年过八旬,住在北京。

坐在我后面的一个男生对试题发生了疑问:“老师,这个题是怎么出的?”他浓厚而响亮的湖南口音打破了考场的肃静,使坐在他前面的人一起转过头去瞅他。他是一个中等个头,黑皮肤的男孩,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大学同学。他的大胆和敏锐引起了我的注意,入学后得知他叫胡献珍。

我不知道我能否录取,因为我毕竟没有读完高中的全部课程,结果呢,在全国几万名报考生中,我录取了。

听说录取的人要在规定的那一天集体乘车北上,但路费要自理。母亲说拿不出路费,所以我未能同行。

我的理想又要因经济困难而被扼杀。我成天在家里坐卧不宁,也不想吃饭,只向母亲嚷着要去上学。母亲说东北很冷,我说我披着棉被也要去上课。现在看来,母亲实在是想让我留下,因为

她毕竟是五十多岁的女人了,需要我精神上的支持。另外,她担心不足十七岁的女孩离开家,作为母亲,她该有多少悬念和恐惧……这些,我当时是一点也不理解的。最终,她拗不过我,弄来了钱让我上路。这不是什么武力的较量,而是女儿的不安和绝望的神情撞击、刺伤了她的神经,她只有妥协。

在家 17 年,家庭的影响在我人品素质的形成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我要求学,要自立,纯粹是自幼父母培养的一种志气。

1950 年 3 月,我独自去汉口火车站买了车票。上路那天,我在火车上倚着窗口坐着,母亲和侄女站在站台上,母亲不说什么,只是不断地抹眼泪……我心中的憧憬与无畏压倒了一切,至于母亲怎样筹措这一笔路费,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完全想不到。

我倚在窗口,耳边充满咕咚咚、咕咚咚火车的运行声,火车头烟筒里冒出的黑烟迎面扑来,我也全不在乎,只是发呆地望着前方。只见火车飞快地向前,把大地旋转地甩在后面。在火车上,似乎没有正经地用餐,也不知道渴。本来应该在丰台下来转车的,但我糊里糊涂将错就错地坐到了北京才下车。那里是新中国诞生的地方,那里有我姐姐的足迹,它使我备感亲切,不自主地要驻足在那里。下车后,找到了姐姐的朋友(她就是那位送米人的女儿),在她那里歇了一夜。她把姐姐参军前穿的一件卷毛灰色大衣、两件旗袍,还有一双鞋给我。第二天,她给我叫了一辆人力车,拉到了前门火车站,登上了去沈阳的火车。

沈阳火车站满街是马车,还有头戴带护耳的棉帽子、身着长棉大衣、足穿高腰棉鞋的剽悍的大个子车夫,完全没有南方人的装束和体态,口音也迥然不同。我叫了一辆马车,到达小河沿医科大学。

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北、湖南、四川和东北三省等地的,还有印尼来的华侨和香港同胞,其装束各异,口音不同,要交流是很困难的,因此,大家不

约而同地学着说东北话。我们的任教老师都是东北人。我们是投奔革命来的,而东北又是老解放区,人们的政治觉悟自然比内地人高,在说话上似乎只有统一到东北口音上才算时尚,才算标准,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需求和自然潮流。同学们都打起“京腔”来,我也不例外。有的南方同学把“咋的也不咋的”(不怎样)、“不得力”(差不多的意思)等方言成天在口里念叨,而且随处应用。有的东北同学还有意识地纠正我的发音,譬如“领导”二字,我总是把“领”字说得比“导”字低,而且高挑“导”字音,受到东北同学多次当面矫正。由于年轻,我说着说着,就形成南方普通话,即有浓厚的唇齿音混着东北口音。至今,西北人说我是东北人,而东北人说我是南方人,南方人又说我是北方人。只有我说起家乡话来,才得到家乡人的承认。

我们这一期学员,即中国医大42期,大约有500多人,一般都不满20岁。个别有二十几岁的是曾上过大学又投奔到这里来的。还有二十几岁的东北同学,他们在我的眼中已是老大得很了。

我们是一群年轻、有朝气、满怀热情、有正义感的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甚至从国外,受党的事业召唤,相聚一堂。

同学们分别住在沈阳小河沿五排楼三层住房内,睡的是大通铺。每一排楼的第一层设一排自来水管。厕所在五排楼外,坑式。

我们一日三餐。一桌10个人,一大脸盆菜,每餐由桌内一人给每人碗中平分一份。主食是高粱米、玉米窝窝头、白面馒头,不定量,随便吃,使我天天有过年的感觉。逢节假日,由院首长送大肥猪一口,伴以大米饭,以改善伙食,这更让同学们兴奋不已,食堂里欢声笑语,人声鼎沸。

入校后头四个月是政治学习,社会发展史从由猿到人讲起,一直讲到解放战争,再讲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建立。同学们心里充满对新事物的向往,个个热情洋溢,朝气蓬勃,排楼间总是飞扬着歌

声——我们热情开朗，我们幸福年轻。是新中国优秀的儿女，是毛主席心爱的学生。我们的青春像团火，我们的意志像块钢……它永远是许多歌声中的最强音。

政治学习结束后，组织上要求每个人写自传，内容包括家庭成员、职业、政治态度，以及与他们的经济关系，家庭社会关系及其职业与政治态度、联系情况，个人的经历（从小到大，哪年到哪年在干什么）。最后由组织上给每人定成分。

我个人的出身是学生，家庭成分是伪官吏兼职员，这是根据解放前三年内与我有经济联系的人，按其职业和政治身份而定的。我的生活来源是父亲和姐姐供给，因而是双重成分。其实，我的父亲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一名小吏，从未在日本占领区工作过，因此，那个“伪”字显然是不对的，正确的应该是“旧”官吏。这个想法是在几十年后才产生的。但在1950年定成分时，由于自己年轻，政治上不知天高地厚，又十分相信组织，竟糊里糊涂毫无顾忌地接受了这个家庭成分，从未提出任何异议，这个“伪官吏”的成分至今仍存在我的档案中。

1950年8月，我被首批批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胸戴大红花，在500多名学员注目中上台宣誓。我记得首批入团的只有几个人。我说这些，不是以此标榜我如何进步，而是想说明：我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拥护，她给我光明，指引我前进的方向。

二 成长与转折

1950年，在我进校后不久，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为配合政治学习，学校组织同学列队去到镇反处决现场，亲眼看到反革命分子应枪声倒下，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1950年10月开始抗美援朝。沈阳距中朝边界——鸭绿江很近，由于打仗需要，42期学生全部转移到黑龙江省北安。那是一座人烟稀少的城市，建筑物很少，极目可见天尽头。它背临中苏边界黑龙江，气候格外寒冷，最低达零下42摄氏度。从南方到东北后的第一个冬天来临了，我穿着一条肉色紧腿棉制筒绒裤，但没有罩裤可罩，足登单鞋，再穿着那件从北京拿来的灰色卷毛平膝大衣。这种不足以御寒、华而不实、似摩登又不摩登、七拼八凑的装束常引起同学们的讪笑，有人说我是高丽人，但我并不顾忌这些。天气一天天更冷了，组织上给需要的人发一套黑色棉袄裤，一顶黄绿色棉帽。我自入学以后，经济上完全依靠学校，所以也领到一套。但脚上还是那双单鞋，很冷很冷，有的脚趾头已有轻度冻伤。为了能买到一双棉鞋，星期天，我拿着那件灰色卷毛大衣，沿街去老乡家变卖，但几乎都是用摇头回答，不多说一句话。以后棉鞋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已回忆不起来了。

那时，我每月的助学金是11.5元，其中10元或11元由学校膳食科扣走，所以我每月可领到1.5元或0.5元钱的零花钱，去买笔墨纸张和洗漱用品。自从我领到那一套冬装后，这点零花钱也不发了，为的是抵偿那套冬装钱。大约扣了一年，才偿还清。在这

期间,由于买不起肥皂,我的衣服和脖子很少清洗,学生会卫生部检查个人卫生时,我是最差的。

我们分别住在几间大房子内,室内设有几十人睡的大通铺。厕所在露天。

学校开设了业务课,有化学、物理、微积分、生物、俄语等课程。由于寒冷,冻得钢笔不下水,记不成笔记而经常停课。

除了上课外,就去抬撤下来的伤残志愿军,为他们作慰问演出,给他们献血。还向老乡们作抗美援朝必胜、南朝鲜必败的宣传教育。

虽然气候寒冷,滴水成冰,生活和学习条件都很艰苦,但我和同学们一样,爱国热情高涨,愈加坚定为祖国、为人民学习的信念。

1951年5~6月,入侵者已从鸭绿江边被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收复了朝鲜北部的绝大部分土地,战局趋向决定性胜利,我们全体学员又迁回沈阳。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我受到了艰苦朴素的教育,初步树立了为祖国学习和献身的思想,并且第一次听到彭德怀大元帅的名字。

1951年冬至1952年春,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1952年春,枪毙了大贪污犯、蜕化变质分子——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以及专员张子善,大振党威。人们无不传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的名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1952年夏,根据党中央于1951年11月30日发出的《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学校在教师中开展

思想改造运动。我期学生停课,参加教师的批判检查。黑板报也是批判的工具。我因为得了阑尾炎,未能亲自参加,但通过看报纸和校内的黑板报,受到了分清敌我的正面教育。

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我的印象是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批判胡风的“舆论一律”,以后又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5~6月,“《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在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为任务的。’”^①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我的男友(1952年我们相恋,1959年结婚)也受到批判,原因是他听说苏联红军在东北有侮辱妇女的行为以及中苏边界有问题,带着这种疑问和不满,向团小组长汇报过。在反胡风运动中,以反苏的名义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当时他非常委屈,流着眼泪对我倾诉,还说“在这个世上再没有像你这样对我好的人了”。可见他当时的压抑感和孤立感何其深!政治上的打击何其大!我是不喜欢看男人流泪的,于是推开他说:“哭什么!”但愤懑不平却在我心中升起。

第二天,我找到他班的团支部书记,质问她说:“他是向团组织汇报思想时谈到的,如有不对之处,应该及时指出,及时帮助,为什么以前不澄清,运动一来,就成了批判材料。这样,团员还敢不敢向组织汇报思想,取得帮助。而且,他根本就不反对苏联。”(那时中苏关系很好,称苏联为老大哥,是一切方面的榜样,这叫政治上的“一边倒”)我气愤地一口气说完,支书只是望着我,没有答话,但却把情况向上反映了。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87.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89年6月第一版,218页。